



复 旦 新 闻 与 传 播 学 译 库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

(第二版)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cond Edition)

[美] 威廉·B·古狄昆斯特 (William B. Gudykunst) 主 编
[美] 贝拉·莫迪 (Bella Mody)

陈 纳 胡 特 等译 陈 纳 审校
陶文静 王 海



复 旦 新 闻 与 传 播 学 译 库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

(第二版)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cond Edition)

[美] 威廉·B·古狄昆斯特 (William B. Gudykunst) 主 编
[美] 贝拉·莫迪 (Bella Mody)

陈 纳 胡 特 等译 陈 纳 审校
陶文静 王 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二版)/[美]古狄昆斯特(Gudykunst, W. B.),
[美]莫迪(Mody, B.)主编;陈纳等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8
(复旦新闻与传播学译库)
书名原文: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cond Edition)
ISBN 978-7-309-11663-2

I. 国… II. ①古…②莫…③陈… III. 传播学-研究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9022 号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William B. Gudykunst & Bella Mody

Copyright © 2002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A SAGE Publications Company of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lhi, Singapore and Washington D. C., © 2002 by SAGE publications,
an Imprint of SAGE Publications, Inc.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6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1-321 号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二版)

[美]古狄昆斯特(Gudykunst, W. B.) [美]莫迪(Mody, B.) 主编 陈 纳 等 译
责任编辑/章永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34 字数 808 千

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663-2/G · 1495

定价: 1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简介

威廉·B·古狄昆斯特(William B. Gudykunst), 世界知名的传播学者和文化研究学者。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活跃在文化间传播研究领域, 并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亲自领导和参与了包括美日和美韩之间的传播学研究等一系列项目, 促进了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他是《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主编。古狄昆斯特于 2005 年去世, 至今仍是文化间传播和比较文化研究领域最常被引用的权威学者之一。

贝拉·莫迪(Bella Mody), 美国著名的发展传播学和国际传播学方面的学者, 长期担任科罗拉多大学全球媒体研究的讲席教授, 于 2014 年荣休。她先后在印度和美国接受高等教育, 曾在印度、加拿大和美国的多所高校和机构任职, 曾作为专家受聘于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她在发展传播和国际传播领域有着第一手的经验和深入的研究, 著述甚丰, 是世界一流学者。

译者简介

陈纳，男，社会学博士。1968年初中毕业，到农村插队接受再教育。1978年入北京大学，学习英语语言文学和比较文学。1987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访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天普大学学习传播学和社会学。先后在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数所美国高校执教。现供职于复旦大学，担任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文化与传播研究、宗教与文化研究、发展社会学。

胡特，女，传播学博士。200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传播学硕士、博士。2008至2012年期间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田野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村民的数码影像使用行为，并据此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曾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访学。现任教于浙江外国语学院，从事新媒体与社会变迁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陶文静，女，新闻传播学博士。2006年获山东大学英语和国际政治本科双学士学位，2011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毕业，现为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讲授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大众传播学等专业课程，出版专著《公共商议视角下的中国城市遗产保护报道研究》，发表论文多篇。主要研究领域：城市传播与媒介文化研究等。研究成果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12EXW002)资助。

王海，男，新闻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外新闻史、国际传播与传媒翻译。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和译著18部。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京报》外译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文艺形势与未来发展研究”子课题“当代俄罗斯大众媒体的运作机制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国报人的跨中西文化特质研究”等。

中文版序

面向可持续发展社会的传播学知识

贝拉·莫迪 Bella Mody

(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很荣幸得知,复旦大学出版社和陈纳博士愿意拨冗翻译国际学者关于文化间传播、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以及发展传播的研究手册。需要指出的是,该手册的作者大多数是供职于美国的学者。作为一名从第三世界国家移民到美国的学者,同时也是这本 2002 年出版的手册的编者之一,我敦促中国读者将这本书作为一个进行相关研究的出发点来看待,而不是一个仿效的模板。发达国家(或者说西方国家)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完善的,或者说,在许多方面是并不完善的。因此,除非西方的研究问题、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能够适用于中国(或者你们研究的具体国家)的某些具体问题,否则没有理由照搬西方在研究中所采用的问题、框架和方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 2010 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现在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裕、健康并受到良好的教育。作为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恢复其在 10—15 世纪之间所拥有的世界领先的地位(Maddison, 1998)。中国是多样性的,她拥有 23 个省,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4 个直辖市和 2 个特别行政区;中国各地的地形地貌差异也是明显的,比如甘肃与广东的差异;同时,中国也拥有独特的亚文化群体,不同的信息需求和不同层次的媒介机构(省、市和县级媒体)。由全国和区域生态环境建构的传播媒介也是不同的——既拥有《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这样覆盖全国的媒体,也有各地区和机构开办新闻和娱乐媒体的自由。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一直以基于国家引导的市场经济改革来发展经济并部分地为媒体提供财政支持。单一制的广播行业被重新划分为“四级办广播电视”(中央、省、市和县级)。这一体制给各级广电部门相对的建台和创收自主权。2012 年,有超过 20 家的省级卫视在全国范围播出,与中央电视台竞争,同时还存在着超过一千家的县级电视台。一方面,在这个越发具有竞争性的电视市场上,各具风格的地方电视台为传统的单向大众传播注入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另一方面,互联网和小功率的社区电台为基层受众提供了参与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的机会。

不可否认,卫星和光缆确实把世界更多的地方连结在了一起,然而,文献显示,它们仍然不能算是全球媒体,或者说,这些技术还不能覆盖所有地球上的人类。一些新兴经济体与外部有着较

好的联系,但是在其内部所接收的国际媒体,比如 BBC、半岛电视台和《中国日报》,也只有中产精英阶层能够享用。这本手册所提供的关于跨文化传播、文化间传播、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研究内容,不可能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社会(诸如美国、英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普遍原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媒介系统是在社会真空当中存在的;媒体周边环境里不断变化的力量在持续塑造着传播媒介。这些“形塑的力量”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或者是文化的。这些因素可以来自国外(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来自国内。媒介政策的制定可以来自党中央,也可以来自省级单位。这些形塑因素影响着媒介政策、媒介组织、媒介技术、媒介内容和作为观众和博客写手的公民。不同因素对于媒介和传播行为的影响力此消彼长。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新时代,一些省、市、县和农村地区的共同点可能是以阶层为基础的。所以,传播学研究的设计需要把权力形塑媒体这样一个大的背景考虑进去,特别是谁行使权力、对谁行使。

随着时间的迁移,被社会形塑的传播媒介同时也在形塑这个社会,这在本书关于发展传播学的部分可以得到展示。中国国家主导的改革可以主宰媒体,所以除了广告和消费主义的内容以外,教育和健康类的主题也得到了关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与其合作伙伴在 2011 年对以娱乐内容为主导的美国媒体与英国、丹麦和芬兰媒体做了一项对比研究。他们发现,媒介系统的政策和管制是重要的:那些拥有公共服务媒介体系的国家对新闻和公共事务给予了更大程度的关注,这和美国的市场模式不同。当媒体传播的主要内容是新闻而不仅仅是娱乐的时候,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知识差异就要相对小一些。

媒体以公共服务的模式运营,能够缩小贫富阶层之间的知识差异,同时也能够帮助实现更加公平的公民社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经常撰写文章表达他对美国社会 1% 的人口控制 40% 社会财富的担忧;而且 1% 的人决定着剩下 99% 的人如何生活(Stiglitz, 2012)。2007 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 45,而德国是 34。(如果财富分配绝对公平,这个系数是 0;而如果绝对不公平,系数是 100。)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更高,已经达到了 52(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2)。

2012 年 5 月,斯蒂格里茨写道:“99% 的人觉醒了。不平等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阿拉伯之春’的兴起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已经破产了。”另外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信息传播技术同美国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见过的“分心经济学”(economics of distraction, 2011, p. 157)。尽管有大量使用的社交网络,美国社会目前的特征表现为毒瘾、焦虑、孤独和财政压力。造成这些的原因是政客和媒体的互动。中国的研究者们需要注意的是本国的高基尼系数,以及使用什么必要的传播知识来帮助减少人们生活当中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存在于城乡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之间、有产和无产者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以及沿海和西部城镇之间。当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平等,就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和传播学者来研究如何重新分配财富,以及如何利用媒体来影响和培养对于社会不公和社会和谐的态度时候。

国际传播学

在过去的十年里,国际传播学界就“全球化”和是否存在“全球媒体”进行了持续争论。学者们

在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对他们研究的全球化的不同方面进行具体描述——是“资本”扩张,还只是“数据”的跨境传输,或者是被称作“混合性”的文化结果?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相关文章的作者对他们如何使用“全球的”这词也不够精确:他们是指“全面覆盖”,还是仅仅为“全球范围”和“国际的”这两个词找了一个更加时髦的替代品?(Volkmer, 2012; Esser & Hanitzsch, 2012; Mansell & Raboy, 2011)最近,国际传播研究已经开始关注那些不断增长的使用卫星和因特网的“跨国”广播商,以及他们的起源、结构、影响和面临的挑战。学者们正在比较研究英国的BBC、“美国之音”、中国中央电视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法兰西24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等传媒机构。

在出版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有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商,比如Wiley-Blackwell、Sage、Routledge和Taylor and Francis,另外还有新的和经过改版的期刊,比如*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Critical Arts: South-North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和*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其他以区域研究为特色的期刊还有Sage出版社的*Asia-Pacific Media Educator*,这个期刊在澳大利亚编辑但是在印度的新德里出版;Intellect出版的*Journal of African Media Studies*或者*Th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这个期刊由新加坡国立科技大学编辑,由Taylor and Francis在英国出版。Taylor and Francis集团认为中国的传播领域值得拥有一本单独的期刊,所以就有了*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由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编辑。最近有一期包括了书评和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的的文章。这些文章涵盖了广泛的主题:网站、社交网络、博客、报纸、创意产业、广告、电影、电视、市场结构、人际传播、隐私、性别、民主和帝国主义的新形式。由于近期互联网的崛起及其带来的广泛应用,互联网相关的话题也成了发表文章的一个关注点,诸如博客、公民记者和社交媒体。

更好的研究应该是根植于本土社会当中,来检视国家、私人资本、阶级和民族在塑造新技术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方面的研究实例有Liang Zheng(2011)研究中国新疆维吾尔族民考汉的博士论文。Hong Zhang在*Gazette*(2011)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电视全球化的论文和Weber(2011)的关于中产阶级网络用户的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带来了超越政治传播学研究的数量增长(Sparks, 2012),这些研究关注文化群体对于传播媒体的塑造作用,以及媒体如何反过来塑造文化身份。政治力量的塑造作用依然受到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新媒体技术如何使得同样的媒介能够给不同的受众来定制内容。Liu and Lee的研究(2010)展示了中国的国有媒体在涉及苏丹的新闻上如何对英语和中文的读者进行新闻剪裁。由于中国不断提升的经济力量,使得中国成为受到研究最多的国家之一。郑亮(Zheng, 2010)关于中国和非洲的研究在*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的期刊网站上是“阅读量”最大的论文之一。有关中国的论文经常关注的议题是“公共外交”和“软新闻”(Hu & Ji, 2012; Qing Cao, 2011)。

对媒介帝国主义的再次概念化也在进行中,特别是在美国作为单一超级大国正在衰落而跨国公司利益得到强化,以及在印度、巴西、尼日利亚和墨西哥的电影产业得到认可的背景下。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Oliver Boyd-Barrett即将出版的著作。在1994年,Oliver Boyd-Barrett曾经指出,美国的媒介公司在衰落,但是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并且文化产品的真正角色是把国内和国外市场盈利链接起来。在未来的时间里,消费行为及其广告业所导致的对阶级身份认同的影响,无疑值得中国学者更多的关注。

发展传播学

1979年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同时人均收入增长了50倍。在不到三十年时间内,中国将大概5亿人口从贫穷状况解脱出来,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而未来对于中国的挑战包括:①如何以低碳环保的方式帮助剩下的一亿五千万人口脱贫,尤其是那些在西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②减轻不平等程度,尤其是在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之间的不平等。③由教育和工作机会造成的男女之间的差异,也需要解决。④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意味着中国需要让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的独生子女能有充分的能力来抚养双方的父母和祖父母。⑤中国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目前在下降的同时中国内地的就业机会则增加了,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很多人选择在本地打工,而不是移居他乡。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取决于其是否能兑现给社会带来持续繁荣的承诺。中国发展环境的改变决定了传播媒介使用上的改变。

在其他方面,关于防治“非典”、艾滋病或者腹泻的宣传活动的研究将继续进行,这些研究得益于诸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某些双边组织,比如USAID,某些多边组织,比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某些非政府组织,比如大赦国际。研究的重点目前在于增加对于这些防治活动的普及率和提高其有效性。

在发展传播学领域一个新的建构性力量就是社会运动。新闻报道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工人为了维权而形成“群体性事件”,学术文章在今后需要关注这些问题。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出现目前才得到初步的关注(Weber, 2011)。另外,在中国、印度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些脱离了贫困并获得了读写能力的人如何看待新闻和娱乐,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我们基本不知道他们在消费时候的喜怒哀乐。我期待看到的是那些新获得读写能力的人和那些生活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人,如何用媒体来改变自己的社会生活。本手册后半部分谈到的20世纪下半叶的理论是否还有效?如果不再有效,究竟对这些理论需要多大程度的修正?发展和消灭贫困的传播活动是要由官方媒体来主导吗?这样的情况与后殖民时期的南亚、非洲、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官方媒体与基层和国家单位合作得究竟怎样?如果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和江苏的脱口秀节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那么,它们如何在媒体进行公共服务方面扮演相应的角色?广州的南方报业集团和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群体,是如何通过媒体来解决农村地区社会不公和社会不平等的?作为内陆省份的甘肃和湖北,出版的某些杂志在全国具有相当大的读者群,那么,这些地方的政治和经济能力为当地的穷人和文盲状况的改变做了什么?在设定媒介支持的目标的时候,是否有受众参与?节目设计的时候是不是避免了那种由上而下不顾受众感受的情况?(Mody, 1991)

要我针对20世纪发生的情况提出问题,并不困难。然而,我期待看到的是,你们就如何使用媒体来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以及如何降低社会不平等的情况给出答案。

参考文献

Boyd-Barrett, Oliver. *Media Imperialism*. UK: Sage, forthcoming.

- Cao, Qing. The Language of Soft Power: Mediating Socio-political Meanings in the Chinese Media. *Critical Arts: South-North Culture and Media Studies*, 2011, 25: 1, 7-24.
- Curran, James, ShantoIyengar, Anker Brink Lund and InkaSalovaara-Moring. Media System, Public Knowledge and Democracy: a Comparative Study. In James Curran, *Media and Democracy*.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Special Report: Income Inequality Rising Across the Globe. March 12, 2012. <http://blog.euromonitor.com/2012/03/special-report-income-inequality-rising-across-the-globe.html>. Downloaded July 10, 2012.
- Esser, Frank and Thomas Hanitzsch. *Th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don, UK: Routledge, 2012.
- Hong Zhang,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Television: the Role of the Party-stat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11, 73, 573-594.
- Hu, Zhengrong and DeqiangJi. Ambiguities in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the "Going-out" Policy of China's Media and its Multilayered Context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1, March 2012, 32-37.
- Liu, Xun, Seow-Ting Lee and Bella Mody. Comparing China's State-Owned English-Language and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s. In Mody, B. *The Geo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Foreign News*.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0.
- Maddison, Angus.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8.
- Mansell, Robin and Marc Raboy. *The Handbook of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Policy*. London, UK: Wiley-Blackwell, 2011.
- Mody, Bella. *Designing Messages for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n Audience Participation-Based Approach*. New Delhi, India: Sage, 1991.
- Sachs, Jeffrey C. *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 Stiglitz, Joseph E., Occupy Wall Street Returns.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2/05/02/joseph-stiglitz-the-99-percent-wakes-up.html>. May 2, 2012. Downloaded May 26, 2012.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2010*. China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towards a Low Carbon Economy and Society. Beijing, 2010, UNDP.
- Volkmer, Ingrid. *The Handbook of Global Media Research*.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2012.
- Weber, Ian. Mobile, Online and Angry: The Rise of China's Middle-class Civil Society? *Critical Arts: South-North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2011, 25: 1, 25-45.
- Yang, Guobin. A Chinese Internet? History, Practice and Globaliz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 5: 1, 49-54.
- Zheng, Liang. *Media and Minkaohan Uyghurs: Representation, Reaction and Resistanc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2011.
- Zheng, Liang. Neo-colonialism, Ideology or Just Business? China's Perception of Africa.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ume 6(3): 271, Dec 1, 2010.

译者序

促进中国的文化间传播研究

陈 纳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二版的中译本出版了。《手册》^①英文版的编者在“前言”中说,该书是为学有所成的学者,同样也为新入门的研究者和对国际传播或文化间传播感兴趣的研究生,提供的一部参考书^②。其实,在全球化大潮铺天盖地的今天,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征途上每天都面临着种种文化和传播问题的新常态下,本书的读者可以是任何一位对文化和传播问题感兴趣的中国读者。

《手册》的正文分四个部分:跨文化传播,文化间传播,国际传播,发展传播。这四个领域所共有的两个关键性概念是“传播”和“文化”,而在研究方法上共有的一个主要特点则是比较研究^③,这是将四个领域熔为一炉出版这部手册的基本原因。这四个部分的结构非常明晰,每一部分都以一篇关于该领域的“导论”开始,接着的一章讨论关于该领域的理论,随后的四至六章围绕该领域关注的某些核心问题展开细化的讨论,结尾的一章则是关于该领域研究议题的综述。弄清楚《手册》的篇章结构和编者的用心所在,有利于充分利用这部参考书。

鉴于《手册》编者之一贝拉·莫迪(Bella Mody)在《手册》中译本“序言”中着重讨论了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研究,本篇序文将着重围绕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展开讨论。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本是一体的。《手册》编者认为,文化间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是一个大的范畴,“涉及来自不同民族文化的人所进行的面对面的传播行为”;而跨文化传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对不同文化中发生的传播行为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例如,研究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交往沟通的特点属于文化间传播的研究;而将“典型的”中国师生之间交往沟通的特点与“典型的”美国师生之间交往沟通的特点进行比较则是跨文化传播的研究^④。也就是说,从文化与传播研究的概念出发,文化间传播涵盖了跨文化传播。然而,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中,文化间传播和跨文化传

① 在本文中,“《手册》”系《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的简称;除非另有说明,“《手册》”指《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二版。

② 见《手册》“前言”,原文第 ix 页。

③ 参见《手册》第一章,原文第 1 页。

④ 参见《手册》“前言”,原文第 ix 页。

播这两个概念互相替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①。虽说跨文化传播是文化间传播的一个分支,但有时这个分支却长得异常粗壮。在《手册》中,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各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与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并列,而且,在篇章数量和篇幅上,跨文化传播要远远多于文化间传播,前者由导论加八章组成,而后者则由导论加六章组成。或许因为这类情况的存在,给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带来一些“模糊逻辑”。然而,就学科逻辑而言,跨文化传播是涵盖于文化间传播之下的。所以,《手册》第一章对该书所涉各学科的发展做历史性回顾时,只有三个学科:文化间传播、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对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尤其是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了解文化间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基本关系和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手册》第二版的出版是美国文化间传播研究长期发展的结果。细数起来,这已是美国文化间传播领域第三部以研究手册形式出版的重要参考书。对这三部研究手册的内容做一个粗略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该领域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的轨迹。由 Sage 出版社于 1979 年出版的《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②体现了该学科初建阶段的特点。正如其编者在手册简短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提出文化间传播的研究还是一个“跨学科的和创新的”(p. 7)概念。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直接或间接与文化间传播相关的研究文献量不断稳步增长。至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传播学研究者已经对文化间传播过程的种种细节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学科整合起来。出版该书的目的是为了制定出基本规则(ground rules),从而使文化间传播形成一个统一的学科。编者希望通过该书的出版提供必要的概念和理论的框架,以便文化间传播过程中的细节和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得以整合(p. 11)。该书中各章节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叠合,包括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管理学、国际关系、文化研究,等等。编者坦言,作为一种借鉴了诸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文化间传播在当时仍然不可能给出明确的学科范围和界限,而有一点是能够认定的——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内容是关于文化与人际互动的关系(p. 14)。而从学科发生和演化的早期历史进程来看,研究者是从“文化对话”和“文化批评”这两个途径推动文化间传播学科发展的(pp. 14—21)。全书分为六个部分:理论思考,概念框架,文化间传播的议题,数据和资料问题,具体文化的研究,应用研究与培训方法。从这六个部分的划分可以看出,该书从总体上对文化间传播的理论、概念、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具体问题上,尤其是编者在每一部分前面插入的导论性文字中,其基本态度是开放性的、非最终结论性的),并提供了一些实际研究的案例,同时,作为一个学科,文化间传播自创建初始就体现出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特点。

整整十年以后, Sage 出版社于 1989 年又出版一部与文化间传播相关的手册,即《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③。这部手册的出版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卫星通讯和相关技术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发展,跨越国境和跨越地区的信息流量猛增,大大改变了传统通讯和传播的格局,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传播研究和始于 50 年代的发展传播研究,越发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许多组织

① 即使在《手册》的撰稿人中,也有人在混用这两个概念,参见《手册》原文第 19 页。本书编者之一古狄昆斯特也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二者可以混用,参见《手册》原文第九章,第 1 尾注(中译本第 155 页第 2 脚注)。

② Molefi Kete Asante, Eileen Newmark and Cecil A. Blake, eds.,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9.

③ Molefi Kete Asante and William B. Gudykunst,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9.

和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流动不平衡的现象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因而,由“不结盟运动”组织在70年代发起,倡导“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缩写为NWICO)^①运动,其高潮体现为1980年发表的麦克布莱德报告(*The McBride Report*),即《多种声音,一个世界》(*Many Voices One World*)。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研究虽然有别于文化间传播的研究,但又在不同程度上与文化间传播交叉,因为它们都涉及文化与传播这两个核心的要素。此前,在《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中就已经有些章节讨论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②,此处将国际传播(包含发展传播)列为手册书名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势头。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的编者在“前言”中说,该书的宗旨在于“总结国际传播、文化间传播和发展传播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试图将这三方面的研究纳入同一个大框架之下进行考量^③。然而,从该书的具体内容来看,这样的说法和意图显然是勉为其难的。编者选择书名的本意可能是要体现当时传播学研究的潮流和趋势,但各方面条件似乎并不成熟。从“前言”中的某些表述来看,编者自己甚至对于“文化加传播”这样的学科发展尚持有一定的保留,“纵观本书的内容,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学科领域,这是显而易见的”(p.9)。事实上,这部手册的主要内容仍是围绕文化间传播展开的,在全书23章中只有5章是讨论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与十年前的《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相比较,《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中关于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对具体的“传播过程与效果”或“传播情境问题”的研究,都来得更为丰富和成熟。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该书尤其注重研究者的视角问题,一方面继续强调研究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要防范和克服本族群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一方面则深化了关于主客观视角的分析研究。威廉·B·古狄昆斯特和西田(William B. Gudykunst and Tsukasa Nishida)用30页的篇幅集中讨论和总结了理论视角的问题,他们比较了主位(emic)和客位(etic)研究路径的特点,指出两者不可偏废,并从理论构建的角度对两种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和分析^④。与此同时,大卫·约翰逊和弗兰克·塔特尔(J. David Johnson and Frank Tuttle)执笔的一章对于文化间传播的理论机制和研究方法的讨论,则显示出学者对于该学科在整体上有了更深的把握^⑤。这部手册使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文化间传播过程和效果的研究,在全书23章中占11章,这些有关文化间传播具体实践的研究涵盖了从传播者个人到传播群体、从传播媒介到传播方式、从传播者心理因素到社会文化影响等多个方面。在关于传播情境研究的部分,则包括了对传播者的身份认同和人际间的密切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文化间传播人员的培训方法等问题。

又过了12年,Sage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了《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的第二版。虽说是以同样的书名冠以不同版本,《手册》第二版并非在第一版内容基础上的修订,而是几乎完全

① 另有将该运动称为“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缩写为NIICO),参见《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第四章。

② 例如,《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十章和第十一章。

③ 参见《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前言”,第7—11页。第10页的图(Figure P.1. Areas of Inquiry.)为此提供了直观的解释。

④ 见《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第一章。此前,斯坦利·E·琼斯在《文化间传播手册》第四章也对文化间传播研究中的客位和主位路径进行过专门讨论,但古狄昆斯特和西田的分析要更为深入和全面。

⑤ 见《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第二十二章。

重起炉灶另行编写的一部新书。全书共 29 章加上四篇导论和一篇前言,共 44 位撰稿人,其中仅七位曾参与《手册》第一版的撰稿。在《手册》第二版中,文化间传播和国际传播(含发展传播)的内容各占一半篇幅。

从《手册》第二版可以看出,文化间传播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一个学科已经相当成熟。无论在前言、导论还是具体篇章中,已不再见到早年某些研究者对于本学科的基本概念或定义的犹疑踟蹰之词。文化间传播就是一门融汇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传播学学科,以研究跨文化和文化间的人际沟通传播以及与文化的关系为对象的。无论是《手册》各篇章中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文化间传播实践的具体研究,都大量地涉及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然而,读来却顺理成章,使人感到这些学科与文化间传播学之间不仅交叉,而且已经整合为其有机组成部分。顺便说一句,文化间传播的研究同样影响了所关联的诸多学科,促进这些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能够体现文化间传播学科成熟性的另一方面是,该学科诸多分支领域的各个研究方向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文献,其中包括许多原创性的实证研究和跟进性的研究,以及大量的案例研究^①。这对于编撰专业手册类的参考书尤为重要,因为其中收编的文章主要是对本学科或某些特定分支进行综述性的论述,需要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支撑才能真正做到言之有据、令人信服,才能具备权威性的参考价值。《手册》第二版中关于文化间传播的每一章都是在参考了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写就的,但凡理论的探讨、模型的建立、观点的提出无不以具体的研究成果为佐证,各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大多在百种左右,其中仅第六章所列出的参考文献就多达 141 种。《手册》的中译本对每一章末尾所列参考文献(以及书末附录中的索引)采取了原文照搬的办法,这将有利于从事深度研究的学者对文章所引文献追根溯源。毕竟,在手册类参考书的综述性文章中对于所参考的文献只能一带而过,读者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研究的具体问题、方法、结论等,必须查考原始文献。

前后二十多年里出版的三部手册,勾画出文化间传播学科发展的系列图谱,这些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知识的参考,而且对于了解这个学科的历史发展十分有意义。相比之下,《手册》第二版是该学科趋于成熟时的集大成者。不过,作为一门学科的综合性的参考书,《手册》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学科发展的历史原因,手册的内容有很明显的“美国中心”色彩^②。文化间传播研究的各个领域的创始人主要是美国学者;在学科创建早期,研究问题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美国社会文化的现实或是以美国主流文化与其他文化(无论是美国国内的亚文化还是国外的其他文化)之间的碰撞为背景的。随着学科的发展,许多研究将重点移向东西方文化间的传播研究,其中的东方主要以日本为主,西方仍以美国为主。囿于这样的背景,所研究的问题以及得出的结论当然有其局限性。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借鉴这方面的理论和观点尤其要审慎。即使是那些所谓东西方文化间传播的理论,究竟是否可以直接移用于中国,必须经由批判性的审察,最好能够参考建立理论所依据的原始文献再做决定。原因很简单,“东方”或“西方”本是一个粗略的地理概念,而将其作为文化概念则显得过于笼统,尤其是所谓“东方文化”的概念,难免抹煞东方各个国家和族群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局限性的另一个方面是手册内容的覆盖面的问题,即手册在多大程度上

^① 例如,“关于旅居经验之研究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成果,关于[文化]同化的研究数量或许也与之相当”。见《手册》第一章(原文第 3 页)。

^② 参见《手册》第一章(原文第 2 页),作者指出,“文化间传播、发展传播和国际传播各自呈现出相当程度‘美国制造’的色彩,因为各领域的先驱和创立者主要是美国人”。

反映了当时学科发展的全貌。尽管这类手册的编者通常都希望其内容能够全面一些,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组稿人和编者的专业背景、撰稿人的研究领域、时间和版面的限制以及其他的因素,手册的内容总是有选择性的。此外,由于文化间传播这个学科的重心之一是“文化”这个几乎不可定义的概念,加之该学科的基本内容还涉及诸多其他学科,这也必然大增加编者对手册内容的划界和取舍的难度。在《手册》第二版中,因为受限于版面,也因为学科界线的模糊,加之当时某些相关专著新近出版,编者割舍了文化间传播学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关于“群体间传播”(主要是美国社会中不同族群或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的研究,跨文化心理的研究,文化间传播中的权力研究和性别研究等^①。所以,如果要深入了解文化间传播学的全貌,必须在利用《手册》的同时查阅其他相关著作和文献。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二版的两位编者分别是威廉·B·古狄昆斯特教授和贝拉·莫迪教授。古狄昆斯特是美国著名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活跃在文化间传播的研究领域,很快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并亲自领导和参与了包括美日和美韩之间的传播研究等一系列研究项目,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他参与主持编著了《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又与莫迪合作主持编著了该书的第二版。甚至在手册第二版尚未问世时,古狄昆斯特就已经在考虑手册第三版的编写细节了^②。十分不幸的是,这位雄心勃勃的多产学者于2005年因突发中风去世,年仅五十七岁,英年早逝,令人扼腕!莫迪女士是美国著名的发展传播学和国际传播学的学者,长期担任科罗拉多大学全球媒体研究的讲座教授,于2014年荣休。莫迪是来自印度的移民,她先后在印度和美国接受高等教育,曾在印度、加拿大和美国的多所高校和机构任职,并曾作为专家受聘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诸多组织和机构,对于发展传播和国际传播有着第一手的经验和深入的研究,著述甚丰。这次《手册》中译本出版,请莫迪教授作序,她欣然应允,我们非常感谢。在序言中,莫迪以宽广的全球视野,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讨论了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问题。莫迪尤其关注媒体对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结合学科发展的趋势提出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理解全球化的问题、社会权力与平等问题、社会公正与和谐问题、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以及在发展传播学方面中国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比较的问题,等等。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莫迪在《手册》中译本序言开宗明义的那段话:

……作为一位从第三世界移民到美国的学者,同时也是这本2002年出版的《手册》的编者之一,我敦促中国读者将这本书作为一个进行相关研究的出发点来看待,而不是一个仿效的模板。发达国家(或者说西方国家)并非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完善的,或者说,在许多方面是并不完善的。因此,除非西方所采用的研究问题、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能够适用于中国(或者你们所研究的具体国家)的某些具体问题,否则没有理由照搬西方在研究中所采用的问题、框架和方法。

莫迪的这番话,是一位从事了一辈子传播和文化研究的学者的肺腑之言,也可以说是这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国际学者的现身说法。作为来自东方第三世界国家又供职于西方高校并主持过许多国

① 参见《手册》“前言”和第一部分“导论”。

② 参见《手册》第二部分“导论”(原文第180页)。

际研究项目的资深学者^①,莫迪深知世界不同族群、国家之间的文化鸿沟,也明白任何建立于文化研究基础之上的理论与具体文化情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还了解在大量第三世界的研究中由于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作出误导性或错误性结论的情况。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莫迪的话既是忠告也是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手册》涉及的四个方面的内容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如何切实地推动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学科建设实可谓迫在眉睫。自从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概念^②介绍到中国以来,这个学科在中国已经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具体来说,中国的文化间传播研究的发展主要为两块,一块在传播学,另一块在外语教学和研究。由于受到高校学科设置传统的影响,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主要侧重于新闻传播、大众媒体传播和网络传播等方面的研究,而人际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则比较弱,如果要作为一个学科或子学科来说则尚处于起步阶段^③。当今中国文化间传播研究的领军人物主要来自外语教学和研究领域。成立于1995年的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China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隶属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的“全国性民间学术组织”^④,这体现了该学科在中国发展的特色。学会的成立和正常活动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国际的学术活动相当频繁。虽说学科发展始于外语教学和语言文化研究,近年来学科研究的面在逐步拓宽,越来越多非外语教学的研究者加入其中,产生了一批跨学科研究、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但要构建中国版的文化间传播的理论,要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间传播的学科,这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⑤。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走在我们前面,已经取得了大量成熟的研究成果,可以援为参考,但决不可简单地全盘照搬作为中国文化间传播的理论和原则,这正是莫迪的苦心所在。从学术服务于社会的角度来看,21世纪的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和强化文化间传播的研究。然而,无论在建设中华多民族的和谐社会方面,还是要服务于和平崛起的大国走向世界,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化间传播研究至今仍是短板。这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当然也是学科发展的极好机遇。时代在呼唤,呼唤一切有志于此的各学科的学者投入更多的努力,在实践中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的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我们希望,《手册》中译本的出版能够有益于这方面的努力和发展。

《手册》中译本的翻译是众人合作的结果,全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陈纳等四人承担,具体分工如下:陈纳(复旦大学)负责“前言”、第一章和第一部分,陶文静(上海政法学院)负责第二部分,王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负责第三部分,胡特(浙江外国语学院)负责第四部分。此外,郑亮(新疆大学)翻译了莫迪的《手册》中译本“序言”。全书内容由陈纳审校定稿。在《手册》中译本的出版过程

① 必须指出,并非所有“资深学者”(无论是有第三世界背景的还是直接来自西方的)都具有这样的学术眼光和思想境界。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当今世界的主流仍然深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在非西方的情境中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和原则仍然相当普遍。在中国学术界,关于理论本土化的问题,讨论不少,实践不够。

② 由于介绍的途径不一,英语“communication”一词的汉译出现了好几种,包括传播、交际、交流、传通等。30年来,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这两个概念在汉语中缺乏区分,至今仍常常混用。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间传播的问题。参见《手册》中译本“译后记”。

③ 参见廖圣清等,“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十五年:1998—2012”,《新闻大学》2013年第6期。

④ 见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学会简介”和“学会章程”。学会网址 <http://chinacafic.heep.cn/>,2015年5月4日下载。

⑤ 参见胡文仲,“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载贾玉新主编:《跨文化交际研究》(第二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另参见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2期。

中,我们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章永宏编辑自始至终的支持,谨此表示由衷感谢。《手册》的翻译出版是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027)“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子项目之一,特此铭谢。同样要在此感谢的还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潘忠党教授、复旦大学廖圣清教授和范丽珠教授、北京大学甘怡群教授,他们为《手册》中译本的翻译和出版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建议和资讯。

2015年6月
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